DOI:10.20270/j.cnki.1674-117X.2026.5016

炎帝文化的湖湘源流：官民共祭与文化形塑

李斯，王理鹏，龚丽文

（湘潭大学 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 碧泉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炎帝与神农原非一人，其形象是后世对农业文明开创者的不断追述与神化的结果。基于共同的社会风习和历史记忆，湖南逐渐确立了炎帝文化发源地和炎帝祭祀的核心地位。由宋至清持续在此隆重举行的国家祭祀，以及民间盛行的祭祀活动，使得炎帝陵成为政治合法性与中华民族认同的象征。官民共祭强化了炎帝信仰的社会根基，并将炎帝文化的民本奉献、经世致用、敢为人先和开放包容的精神深刻融入了湖湘文化血脉，塑造了湖湘文化的独特品格。

关键词：炎帝祭祀；炎帝文化；湖湘文化；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B93；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26)05-0143-08

炎帝与黄帝共同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关于炎帝神农氏，马平安在《炎帝文化与中华文明》中有细致、完整的研究，认为“炎帝”是上古时期神农氏氏族部落的发迹始祖，而“神农”是其领袖尊号。战国以后，出于政治需要，“炎帝”和“神农”最终合户。马平安分析了炎帝氏族起源地望及足迹陵寝，并对炎帝为中华文明发展所做突出贡献进行了详细论述[1]。吉成名主要分析了炎帝祭祀对文化传承、文化建设、经济建设以及海峡两岸关系的重要作用和炎帝祭祀的重要意义[2-6]。吴新锋与张钰青以湖南炎帝陵为中心分析了炎帝神话多元一体建构和在地化仪式，认为其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重要作用[7]。可以看出，既有研究大多立足于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宏观层面以及当代意义等视角展开探讨。湖湘地区作为炎帝活动的主要区域之一，不仅存在大量与炎帝相关的地名、古迹与传说，还拥有历史悠久的炎帝陵寝。然而，当前学界对炎帝文化在湖湘地区的在地化实践、官民共祭传统以及炎帝文化对地方文化精神的深度塑造等方面的系统性研究，还严重不足。

从宋代开始，官方对湖南炎帝陵的祭祀就从未间断，民间也普遍存在炎帝信仰，炎帝祭祀历史在湖湘大地上已存续上千年之久，官民共祭传统对于炎帝文化的传播、湖湘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拟通过分析传世文献、地方志、碑刻及考古资料，系统考察湖南与炎帝关联的建构过程及祭祀传统，探求炎帝文化因子对湖湘文化的深远影响，从而追溯湖湘文化的精神源头，续写湖湘文化的精神谱系。

一、炎帝事迹的历史书写

炎帝，后世又称“神农氏”，或称“炎帝神农氏”。在先秦典籍中多见“神农”与“炎帝”的记载，

收稿日期：2026-01-30

基金项目：国家“十四五”规划重大项目“《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编纂工程”（SJS20-003）；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秦汉使者与族群交融研究”（24BZS008）

作者简介：李斯，男，湖南长沙人，湘潭大学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秦汉史、出土文献与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

但从文献记载来看，他们似乎更像是两个独立的传说人物，且“神农”出现的时间可能更早于“炎帝”。东汉之前，文献中的炎帝和神农氏往往是分而述之，二者事迹不同，生活的时代和地域也各不相同。先秦典籍中，或单独提及神农，如“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耕而种之，作陶冶斤斧，破木为耜锄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以助果蓏之实”[8]；或单独言及炎帝，如“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9]392；或两者同现于一书却未明言其关系，如“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10]336。这些记载表明，炎帝与神农最初应当并无关联。

结合先秦文献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神农与炎帝的形象存在显著差异。神农多以人的形象出现，常与伏羲氏、黄帝、尧、舜等上古帝王并列。如《周易·系辞下》记载：“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11] 凸显神农氏创耒耜、教耕稼、通交易之功。《管子》与《庄子》亦将其与古圣王并列，称赞神农之世的利民之政与淳朴之风。《管子》云“神农教耕生谷，以致民利。禹身决渎，斩高桥下，以致民利。汤武征伐无道，诛杀暴乱，以致民利。故明王之动作虽异，其利民同也”[10]400。《庄子》言“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牺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若此之时，则至治已”[12]。

炎帝在先秦文献的记载中则处于人神共存状态。其既作为姜姓部族始祖以“人”的形象出现，如《左传》云，“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13]。《国语》亦言，“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9]392。炎帝也以神的形象出现，与祝融搭配，成为主司夏季天神。如《礼记·月令》曰：“孟夏之月，日在毕，昏翼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14]《吕氏春秋》云：“季夏之月，日在柳，昏心中，旦奎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15]

自先秦以降的各种典籍对“炎帝”和“神农”的记载均间接取材于上古传说，缺乏直接文字可考的信史依据[16]，但二者合并的原因可以在古史传说的形成规律中找到答案。正如顾颉刚先生针对自己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一重要学术概念所详细解释的，它具有三层核心意涵：“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17]“炎帝神农氏”的形成与流传也经历了“层累地造成”的过程，后世文献中所见炎帝神农氏的形象，是后世学者对不同时期古史传说不断追述、叠加与整合的结果。

“炎帝神农氏”的整合，是对上古农业文明多元起源的一种象征性统合。考古证据显示，农业的发明并非一时一人之功，中国南北方的农业起源是各自独立的。“炎帝神农氏”在全国范围内的流传，实际上是对农业诞生时代对文明作出贡献的先民的神格化。各地均有为农业诞生作出贡献的先民，这与“帝生于姜水，因姓姜。以火德王，称炎帝。一云赤帝；一云有焱氏始作耒耜，号神农氏；一云农皇，以起烈山，亦号烈山氏；一云厉山氏；一云连山氏；一云朱襄氏。初都陈，后居曲阜”[18]形成了呼应。炎帝的诸多名号，折射出不同地区农业起源的多样性。值得注意的是，炎帝最初是与黄帝、青帝、白帝、黑帝并列的五方帝，是纯粹的神祇，如“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19]1641。此时所祭祀的炎帝是五方帝中的炎帝，而非“炎帝神农氏”。先秦文献中炎帝的人神二重性，标志着其由五方帝向人文初祖的过渡。

“炎帝”与“神农氏”的合并促进了人文初祖的炎帝形象的形成，这一关键转变发生于汉代。西汉

刘歆在《世经》中将两者合称，东汉班固在《汉书》中引用了这一说法：“炎帝《易》曰：‘炮牺氏没，神农氏作。’言共工伯而不王，虽有水德，非其序也。以火承木，故为炎帝。教民耕农，故天下号曰神农氏。”[20]至此“炎帝神农氏”这一合二为一的称谓被官方正式统一。这次整合使炎帝的神格与神农氏的人格相融合，炎帝神农氏的形象变得更为丰满，同时与南方的联系也更为紧密。

二、炎帝与湖南关联的建构

炎帝神农氏与湖南相关的记载在先秦两汉时期较少。屈原在《离骚·远游》中写道：“指炎神而直驰兮，吾将往乎南疑。”[21]157 所谓“炎神”或即炎帝，与湖南地区由来已久的火神崇拜习俗有关。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注释道：“过衡山而观九疑也。”[21]160 此“九疑”即指湖南的九嶷山。这是炎帝较早与湖南相联系的文献记载。1995 年，湖南道县玉蟾岩发现了距今约 1.2 万年前的人工栽培稻谷壳[22]，其地点与九嶷山都位于今湖南永州市。这一发现表明此地是早期稻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区，为后世将炎帝神农氏与湖湘地区相关联提供了深厚的农耕文化认同基础。

湖南里耶出土的秦代简牍中可见“祠先农”等相关记录，有学者认为其可能与炎帝神农祭祀有关。2002 年，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里耶镇里耶古城发现大批秦代简牍，主要内容是秦洞庭郡迁陵县的档案，包括祠先农简、地名里程简、户籍简等。有论者认为，里耶古城出土的一组共计 22 枚的“祠先农简”，堪称迄今所见时代最早的以“少牢”祭祀“先农”的简文[23]60。就简文提及的“祠先农”具体内容，整理者指出“卅二年”即秦始皇三十二年，该年三月二十一日，仓库管理者“是”、助手“狗”及监督者“尚”从库房调出物资祭祀先农，并于当日完成“分胙”，工作简明而高效。至于简文中的“先农”究竟是炎帝神农氏还是后稷的问题，整理者依然倾向于“先农是神农”[24]。

有学者将里耶与周家台出土简牍与传世文献综合考察，认为秦灭周后“周既不祀”，且《史记·封禅书》中秦代的祭祀对象也无周人先祖“后稷”，此外秦简中“先农”春三月的祭祀时间与汉代所设“后稷”配食灵星祠的秋八月的祭祀时间不同，据此推断秦时先农“可能与周人先祖后稷无涉”[23]65-66。但随着时间推移，“先农”至迟在东汉时已经被认为是“神农”了，《后汉书》引东汉初卫宏《汉旧仪》曰：“先农即神农炎帝也。祠以太牢，百官皆从。”[25] 其祭祀规格也从秦代“少牢”升格为“太牢”。秦代时今湖南境内就有的这种较为原始的农神祭祀，为后世炎帝与当地关联的建构提供了祭祀传统资源与文化接受的基础。

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系统梳理了上古帝王谱系，其在构建炎帝神农氏与湖南的关联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言“炎帝……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葬长沙”[26]，明确指出炎帝神农氏葬于湖南地区。唐代司马贞在《三皇本纪》中承袭此说，曰：“炎帝……立一百二十年崩，葬长沙。”[19]4052-4053 这一说法之后广为流传，使得炎帝神农与湖南的关联更加紧密。

宋代是确立炎帝祭祀与湖南关联的又一关键时期，在此期间，官方正式认定并确立了炎帝陵的崇高地位。宋朝官方认为宋朝属火德，因此对炎帝的祭祀尤为重视。宋乾德五年（967），据说在“长沙之尾”茶陵县南 100 里处的康乐乡发现了炎帝陵，宋太祖赵匡胤随即下令修建陵庙。自此，炎帝的安葬之地终于有了明确的具体位置，并开始进行官方祭祀。对此，南宋罗泌《路史》和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均有记载[27]。此后，历代均在此地举行炎帝祭祀活动。对于所谓宋朝政府“发现”炎帝陵的说法，吉成名指出，实际情况是找到适合的地点之后才修建了炎帝陵，而非“发现”了炎帝陵。宋朝政府修建炎帝陵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其不仅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而且对现在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28]。

三、国家礼制与民间祭祀的结合

中国古代素有祭祀历代帝王、先农以及古代圣贤的传统，并为此营建专门的建筑以供奉和祭祀。官

方设有专门的祭祀三皇的礼仪制度，炎帝祭祀正是中华民族传统祭祀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祭祀典制的政治化进程

关于湖南炎帝陵祭祀的官方记载，目前所见最早可追溯至宋代。宋代初期对“先代陵寝”采取保护政策，多次下诏申樵采之禁。乾德四年（966）十月癸酉，宋太祖《前代帝王置守陵户祭享禁樵采诏》云：“自古帝王，受天眷命……太皞葬宛丘，炎帝葬长沙，黄帝葬乔山，颛顼葬临河，高辛葬濮阳，唐尧葬城阳，虞舜葬零陵，女娲葬赵城，夏禹葬会稽，商汤葬宝鼎县，周文王、武王葬咸阳县，汉高祖葬长陵，在长安北，后汉世祖葬洛阳界，唐高祖葬三原县东，太宗葬醴泉县北，凡已上一十六帝，各置守陵五户，每岁春秋二时，委所在长吏，各设一祭。”[29] 从宋太祖钦定的规格，可见宋朝极为重视炎帝祭祀。

南宋史家罗泌所著《路史》，明确提出炎帝葬地在“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所谓天子墓者”。他曾实地考察炎帝陵，并详细描述了其周边地貌。

炎帝神农氏……受火之瑞，上承荧惑，故以火纪时焉……都于陈。盖宇于沙，是为长沙。崩，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所谓天子墓者(《衡图经》云：“炎陵今在麻陂，林木茂密，数里不可入。石麟石土，两杉苍然，逾四十围”)。有唐尝奉祠焉。太祖抚运，梦感见帝，于是驰节夐求，得诸南方。爰即貌祀，时序隆三献(庙在康乐乡鹿原陂上)。恶戏！盛德百世，祀至神农，亡以尚矣。我宋火纪，上协神农，岂其苗裔邪！[30]

所谓“麻陂”当作“鹿陂”，因字形相近而讹误。“炎陵”即炎帝陵，即北宋乾德五年（967）在鹿原陂修建的炎帝陵[31]。

宋朝特别重视炎帝祭祀，当与“五德终始说”有密切关系。这一理论体系自战国萌芽，秦汉奠基，其不仅被用来解释王朝更迭，更成为塑造中华文化认同、理解历史变迁与治乱兴衰的关键思想框架。宋朝认定国运为“火德”，服色“尚赤”，尊崇炎帝为感生帝，故当时及后世多称其为“炎宋”。南渡之后，宋高宗第一个年号即为“建炎”，其用意不言而喻。当时与宋长期对峙的辽（契丹），其官方史书所呈现的族源叙事也追溯炎黄为始祖。《辽史·世表》称“辽本炎帝之后”[32]，出土墓志也反映辽朝上层试图以炎黄后裔身份接续其世系的意图。例如，统和二十七年（1009）《大契丹国夫人萧氏墓志》称萧氏丈夫耶律污斡里“其先出自虞舜”[33]；寿昌元年（1095）《永清公主墓志》云：“国家系轩辕黄帝之后”[34]。宋辽共奉炎帝为始祖，实际反映出中华文化认同的扩大与族群交融的深化。这一特殊历史背景，可能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宋朝官方祭祀炎帝与修建炎帝陵的历史意义。

此后，南宋、元、明、清历代官府都在此地祭祀炎帝，历年官方祭祀不断，一直延续至今。

有元一代，炎帝陵的祭祀活动始终延续。元贞二年（1296）七月，湖南道转呈潭州、茶陵州（时辖酃县）等地上奏，请求增加春秋两季祭祀三皇的经费。朝廷批准从官钱中拨付中统钞二十五两。至大德九年（1305），此项经费增至中统钞二锭。泰定四年（1327），时任茶陵州同知的江存礼（后任国子祭酒），亲赴炎帝陵主持祭祀。

明清时期，湖南炎陵祠庙历经多次修缮，崇祀活动颇为频繁。据当地史志记载，原有“钦遣”致祭明碑十五块、清碑三十八块[35]，由引可见对炎帝的尊崇之隆盛。现存最早的官方祭炎陵文是明洪武四年（1371）致祭碑文[36]298。朱元璋通过祭祀炎帝，确立了炎帝陵的国家祭祀地位，以强化政权合法性宣传。

清代祀典基本承袭明制。据《清史稿》记载：“先农坛位西南，周四丈七尺，高四尺五寸。东南为观耕台，耕耤时设之。前耤田，后具服殿。东北神仓，中廪制圆。前收谷亭，后祭器库。内垣南门外，神祇坛在焉。”[37]“凡遇国家大庆，举行典礼，钦派官员告祭炎帝神农氏陵于湖南衡州府酃县。”[36]274 由此可见，清代对炎帝祭祀极为重视，其祭祀仪式也有了进一步的完善，规定了祭祀的程序，包括迎神、行初献礼、行亚献礼、行终献礼等，每次祭祀程序的开始和结束，均行三跪九叩首礼。

（二）地方民间的祭祀活动

神农炎帝祭祀根植于民间信仰，在官方祭祀典制不断完善的同时，民间祭祀仍绵延不绝。据现存文

献记载，炎陵县炎帝庙民间祭祀活动可追溯至明代。其祭祀形态以祈愿为核心，仪式结构相对简约，诉求亦较为直接。乡民每逢旱魃为虐则虔诚祷雨，岁值秋收则祈求丰收。万历四十八年《重修炎陵庙碑》记载：邑中民众遇“旱潦疠疫，有祷辄应”。碑文阐释其因，在于炎帝圣德深仁，“爱育黔黎”，故能“御灾捍患”，护国庇民，“至奕祀而犹然惓惓也”，民众感恩戴德，奔走祀事弗懈，最终形成了“民之生也，以帝而安；而帝之灵也，以庙而安”的民间炎帝信仰格局[36]304。《炎陵志·杂说》中有言：“鄙乡人凡遇旱潦疠疫，多于陵庙祈祷，有议其亵渎者，不知大圣人德赞化育，福眷生民，于祈祷何嫌。”[36]329

至清代乾隆年间，炎陵周边民众祈祭炎帝以禳解灾异之举仍然频繁。乾隆十七年《重修炎陵奉圣寺序碑》云：“且帝葬于斯，种谷尝药之精爽即凭于斯，以故邑之人民水旱疾疫必祷，祷必应。”[36]306 综观碑铭所载，当地民众凡遇水旱之灾、疫病之患，必赴陵庙祷祀，且深信炎帝神农“祷必应”，这强化了民众对炎帝福佑功能的笃信，成为维系其祭祀传统历久不衰的核心动力。

四、炎帝文化对湖湘文化的塑造

从战国时期炎帝与湖南隐约的联系，到晋代炎帝葬于长沙的明确记载，再到唐、宋、元、明、清官方和民间在湖南的炎帝祭祀，炎帝文化对湖湘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炎帝作为农业文明的开创者，其文化本就深深地融入了农耕文明的基因之中。在湖湘大地悠久的农耕与炎帝祭祀历史中，重复的祭祀仪式不断强化着集体记忆，炎帝的历史事迹在这一过程中被反复提及并受到崇敬，从而将外在的仪式内化为集体心理与行为准则。最终在潜移默化中，民本、务实、开拓创新和开放包容的炎帝精神深深根植于湖湘大地，塑造了湖湘文化的独特品格。这种塑造体现为一个由价值核心、实践指引、变革动力和成长路径构成的有机整体。

（一）以民为本的奉献精神

炎帝文化为湖湘文化注入民本精神的核心价值。炎帝制农具、教耕种是为了解决民食问题；尝百草、创医药是为了解除民病；立市廛、通有无是为了便利民生。《越绝书》云：“昔者神农之治天下，务利之而已矣。不望其报，不贪天下之财，而天下共富之。”[38] 由此可见，炎帝并非高高在上的神祇，而是深入民众、体察疾苦、解决问题的“人民领袖”原型。“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39]，最终因误食断肠草身亡的传说，更是把炎帝以民为本、勇于担当甚至不惜牺牲自我的精神推向极致，使其成为后世湖湘仁人志士永恒的精神指引。

这种原始民本意识在湖湘思想家的学说中得到了深刻的哲学阐发。明末王夫之在总结历史兴衰时，提出“举天而属之民”“即民以见天”[40] 的深刻命题，强调“天意”体现在民心民意之中，统治者必须重民、养民、利民，把民本观念提升至天人关系的哲学高度。

近代以来，这种民本精神从理论层面落实于湖湘人士的救国实践之中。当中华民族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之时，魏源立足现实，主张变革图强，他提出变革的核心原则之一“变古便民”，其意指顺应时代变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百姓的福祉。从维新变法时期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千古绝唱、以无畏气概慷慨赴死的谭嗣同，到辛亥革命阶段黄兴、蔡锷等奋勇投身革命洪流的革命党人，再到无数为共产主义理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湖南仁人志士，他们把朴素的民本精神升华到了为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解放事业而无私奉献、英勇牺牲的伟大实践当中。炎帝文化所蕴含的民本关怀、责任意识和牺牲精神，共同铸就了湖湘文化的道德脊梁。

（二）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

炎帝文化为湖湘文化赋予了经世致用的实践指引。炎帝功绩诸多，其最核心者在于制耒耜、植五谷，开创农耕文明。《周易·系辞下》《白虎通义》等典籍均载有神农制作耒耜之事。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农具的革新即意味着生产力的跃升，耒耜的发明标志着原始农业由点种向锄耕的过渡。农耕在湖湘地区

具有久远的历史源流与坚实的生产基础，对于地处长江中游、以丘陵平原为主的湖南而言，其意义尤为重大。湖南至今仍为中国的粮食生产大省。在数千年的农耕实践中，炎帝文化孕育了湖湘先民敬畏土地、遵循农时、推崇勤劳的务实精神。

这种源于生存需要、着眼现实实效的务实精神，构成了后世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思想的源头活水。从宋代湖湘学派胡宏、张栻等倡导的学贵力行、明体达用，到明末清初集大成者王夫之批判心学空疏，主张即事穷理、知行相资，务实精神沉淀为湖湘文化的一大底色。

近代以来，面对内忧外患，这种务实精神从理论层面转化为变革救国的实践。以陶澍、贺长龄、魏源为代表的经世派，与以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湘军领袖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无不强调解决现实问题、富国强兵的实效。他们兴办实业、改革漕运、整饬吏治、引进西方技术，将湖湘务实精神从农耕领域推向了更广阔的社会政治舞台。所谓湖南人“霸得蛮”，指的是湖南人普遍具有基于克服实际困难而不屈不挠的务实韧性。炎帝开创农耕文明，为湖湘文化注入了脚踏实地、重视生产、讲求实效、坚韧耐劳的务实基因，其化作湖湘人士应对自然挑战与历史变局的精神动力。

（三）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

炎帝文化为湖湘文化注入敢为人先的变革动力。炎帝的历史功绩有诸多“第一”，如首创耒耜，开启农耕文明；遍尝百草，建立医药体系；首倡市廛，奠定商业雏形等。炎帝实则是一位伟大的发明家与实践探索者，在知识极为贫乏的原始社会，他大胆尝试、勇于创造、改善民生，为人类文明的演进奠定了基础。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激励原始先民不断战胜自然、创造灿烂文明。这种敢为人先的开拓基因经历史沉淀，深深烙印于湖湘文化的血脉中，为湖湘文化的孕育与发展注入了最初的变革开拓因子。

此变革开拓精神在宋代湖湘学派的哲学中，实现了由自发实践向理论的升华。胡宏、张栻等湖湘学派学者倡导学贵力行、务求实用，借以反对两宋之际空谈性理、不切实际的风气。明末清初王夫之又提出“更新而趋时”[41]的思想，此种主动变革、与时俱进的品格，成为后世湖湘学者敢为人先、开拓创新的精神指引。

近代中国面临内忧外患之际，这种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再度迸发出旺盛生命力。从魏源首先“开眼看世界”将中国置于全球视野下，到曾国藩、左宗棠等洋务派率先发起洋务运动、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再到谭嗣同等流血维新，黄兴、宋教仁等人献身革命，湖南成为近代中国变革图强的核心策源地之一，其动力正源于这种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湖南人在近代的关键历史节点，始终勇立潮头、奋发进取。从远古先民首创耒耜，到湖湘学派提出力行趋新，再到近代湖湘仁人志士首倡变革、力求图强，其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与“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的性格相得益彰，铸就了湖湘文化与时俱进的鲜明个性。

（四）兼收并蓄的包容精神

炎帝文化为湖湘文化塑造了兼收并蓄的成长路径。作为部落联盟时代的重要部族，炎帝部落不仅继承了燧人氏、伏羲氏等上古文化，更在与黄帝部落的交流融合中，充分展现出兼收并蓄的开放特质。先是“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之后“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9]392，最终“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19]4。尽管炎帝与黄帝之间存在世系更替，但以农业为本的底色并未被改变，炎帝文化赋予中华文明的基因仍旧延续。孟宪实认为：“黄帝并不是单纯地取代炎帝，而是与后者有着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姜姓与姬姓世代通婚，奠定了炎黄集团的血缘基础，从而使得炎黄集团走上了更稳定的合作发展之路。”[42]一些考古学者认为，炎帝文化和黄帝文化同出于仰韶文化。许顺湛曾提出，“仰韶文化的时代可与炎帝黄帝相对应……仰韶早期不能排除黄帝族的文化，仰韶中晚期不能排除炎帝族文化”[43]。可见这两种文化在早期就已存在密切联系。两大部族融合之后，伴随着势力扩张与人口迁徙，其文化传播向更广阔的空间拓展，庙底沟文化彩陶因子的扩张便是典型例证。炎帝与黄帝同源异流又最终合流的历史记忆，深刻反映了炎帝文化兼收并蓄的包容精神。这种包容精神的因子，在自古以来作为中原文化、楚文化与南方文化交汇处且地处南北要冲的湖湘大地上，表现得尤为生动清晰。从屈原在《楚辞》中将中原文化与南方巫觋文化相融合，

到宋代湖湘学派博采众长，融合理学各家之言最终自成一家，无不体现了这种开放包容的精神。

近代以来，在“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这一精神从文化的交融升华至文明的互鉴。从魏源于《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44]，到洋务运动时期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积极兴办近代工业，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切实付诸实践；再到郭嵩焘出使欧洲，以开放包容的心态考察西方政教制度后撰写《使西纪程》，反对固守夷夏之大防；从早期共产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到毛泽东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这一切皆深刻彰显了兼收并蓄的开放包容精神。这种兼收并蓄并非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以文化自信为根基，不断借鉴吸收外来的文明精华。正是这种开放包容的文化特质，使湖湘文化能够在危难关头不断焕发生机，进而成为推动历史进步与民族复兴的重要精神力量。

炎帝作为与黄帝并列、为中华民族作出突出贡献的人文初祖，与诸多古史传说人物一样，经历了“层累地造成”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作为人的炎帝与作为精神的神农氏，因在不同地区对农业的贡献而在传播中逐渐相结合。与此同时，作为五方帝的炎帝与作为人的炎帝亦处于相互融合的过程中。至汉代，“炎帝”与“神农氏”最终合二为一，此后文献中多称“炎帝神农氏”。炎帝与湖湘地区的联系源远流长，在先秦屈原的《离骚》中便有所体现；里耶古城出土的“祠先农”简反映了秦代湖湘地区对农神的祭祀，这种祭祀为湖湘地区与炎帝关联的建构提供了土壤，直至西晋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将炎帝陵与长沙联系起来。北宋官方将炎帝陵的具体方位定于今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的鹿原陂，相关祭祀典制逐渐完善，南宋、元、明、清均承袭此传统，同时民间以祈福禳灾为核心诉求的炎帝信仰与祭祀经久不衰。炎帝事迹在湖湘地区的历史书写、广泛传播与信仰祭祀，为湖湘文化奠定了以民为本的奉献精神、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及兼收并蓄的包容精神之底色。炎帝所播撒的文化基因，经湖湘学派的理论熔铸与淬炼，再到近代以来湖湘仁人志士躬身践行救国大业，始终一脉相承、与时俱进，其让湖湘文化在岁月沉淀中历久弥新，至今依旧熠熠生辉。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论述亦存有一些局限。首先，研究主要依据传世文献及现有出土文献，对田野调查资料搜集不足；其次，将炎帝文化视为湖湘文化的核心源头之一，固然能清晰揭示两者间的深厚渊源，但也可能因此忽略一重要事实——湖湘文化的形成，实为多种文化因素相互交融、共同作用的结果。未来的研究需细致梳理湖湘文化所受其他地域历史因素的影响，同时结合山西、陕西、湖北等炎帝传说流传区域的文化开展比较研究，以此更精准地阐释炎帝文化对湖湘文化的独特塑造价值。

参考文献：

[1] 马平安 . 炎帝文化与中华文明 [M]. 北京：团结出版社，2023.
[2] 吉成名 . 炎帝祭祀与文化传承 [J]. 湘南学院学报，2019，40(1)：1-5.
[3] 吉成名 . 论炎帝祭祀对文化建设的影响 [J]. 怀化学院学报，2017，36(3)：1-4.
[4] 吉成名 . 炎帝祭祀与经济建设 [J]. 怀化学院学报，2015，34(12)：12-16.
[5] 吉成名 . 炎帝祭祀与海峡两岸关系发展 [J].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18(6)：70-73.
[6] 吉成名 . 论研究炎帝祭祀和黄帝祭祀的意义 [J].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20(3)：55-59.
[7] 吴新锋，张钰青 . 炎帝神话多元一体建构与在地化仪式重构：以湖南炎陵县炎帝陵为中心 [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5，30(2)：109-118.
[8] 朱右曾 . 逸周书集训校释 [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167.
[9] 左丘明 . 国语 [M]. 陈桐生，译注 . 北京：中华书局，2013.
[10] 管仲 . 管子 [M]. 房玄龄，注 . 刘绩，补注 . 刘晓艺，校点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11] 万里，刘范弟，周小喜 . 炎帝历史文献选编 [M].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2：7.
[12] 庄周 . 庄子 [M]. 方勇，译注 . 北京：中华书局，2010：154.
[13] 杨伯峻 . 春秋左传注 [M]. 北京：中华书局，2018：1445.
[14] 孙希旦 . 礼记集解 [M]. 沈啸寰，王星贤，点校 . 北京：中华书局，1989：439.
[15] 吕不韦 . 吕氏春秋 [M]. 陆玖，译注 . 北京：中华书局，2011：156.
[16] 刘玉堂，刘礼堂 . 炎帝、神农氏、烈山氏的分合因由：兼论远古传说变异与原始民族融合之关系 [J].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4)：63.
[17] 顾颉刚 . 古史辨自序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2.
[18] 严可均 .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M]. 北京：中华书局，1958：1.
[19] 司马迁 . 史记 [M]. 裴骃，集解 . 司马贞，索引 . 张守节，正义 . 北京：中华书局，2014.
[20] 班固 . 汉书 [M]. 颜师古，注 . 北京：中华书局，1962：1012.
[21] 王逸 . 楚辞章句 [M]. 黄灵庚，点校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22] 曾昭山 . 炎帝神农氏与湖南稻作农业的起源 [J]. 科技和产业，2009，9(12)：139.
[23] 宋超 . “先农”与“神农炎帝”：以里耶、周家台秦简为中心的讨论 [C]// 霍彦儒 . 炎帝·姜炎文化与民生 . 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
[24]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里耶发掘报告 [M]. 长沙：岳麓书社，2007：194−196.
[25] 范晔 . 后汉书 [M]. 李贤，张大安，刘讷言，等，注 . 北京：中华书局，1965：108.
[26] 王云五 . 帝王世纪及其他一种 [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3.
[27] 王象之 . 舆地纪胜 [M]. 李勇先，校点 .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2288.
[28] 吉成名 . 论宋朝政府“发现”炎帝陵 [J]. 湘南学院学报，2023，44(1)：49.
[29] 司义祖 . 宋大诏令集 [M]. 北京：中华书局，1962：585.
[30] 纪昀 . 四库全书：第 383 册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89−96.
[31] 吉成名 . 罗泌与鹿原陂炎帝祭祀 [C]// 陈代湘 . 湘学：第 9 辑 . 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22：237.
[32] 脱脱，铁睦尔达世，贺惟一，等 . 辽史 [M]. 北京：中华书局，1974：949.
[33] 盖之庸 . 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 [M].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118.
[34] 袁海波，李宇峰 . 辽代汉文《永清公主墓志》考释 [J]. 中国历史文物，2004(5)：71.
[35] 株洲市修复炎帝陵筹备委员会，酃县修复炎帝陵工程指挥部 . 炎帝和炎帝陵 [M].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47.
[36] 蒋鐄，吴绳祖，王开琸 . 九疑山志两种·炎陵志 [M]. 梁颂成，李花蕾，点校 . 长沙：岳麓书社，2008.
[37] 赵尔巽，柯劭忞，缪荃孙，等 . 清史稿 [M]. 北京：中华书局，1977：2490.
[38] 袁康，吴平 . 越绝书 [M]. 乐祖谋，点校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95.
[39] 刘安 . 淮南子 [M]. 陈广忠，译注 . 北京：中华书局，2012：1118.
[40] 王夫之 . 船山全书：第二册 [M]. 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编校 . 长沙：岳麓书社，1988：327.
[41] 王夫之 . 船山全书：第十二册 [M]. 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编校 . 长沙：岳麓书社，1992：416.
[42] 孟宪实 . 关于炎黄传说的历史研究 [J]. 北京社会科学，2023(4)：70.
[43] 许顺湛 . 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 [J]. 中州学刊，1992(1)：68.
[44] 魏源 . 海国图志 [M]. 陈华，常绍温，黄庆云，等，点校注释 . 长沙：岳麓书社，1998：1.

Huxiang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Yandi Culture: Joint Sacrifices and Cultural Shaping

LI Si, WANG Lipeng, GONG Liwen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History and Culture/Biquan Academy,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Yandi and Shennong were originally not the same figure; their images are the result of continuous retelling and deification of the founders of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by later generations. Based on the common social customs and historical memory, Hunan was gradually established as the birthplace of Yandi culture and the core site of Yandi sacrifices. From the Song Dynasty to the Qing Dynasty, grand state sacrificial ceremonies and public sacrificial activities were continuously held here, making the Mausoleum of Yandi a symbol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and the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joint sacrifices conducted by both officials and the public strengthened the social foundation of the Yandi belief. It also deeply integrated the core spirit of Yandi culture—people-oriented devotion, pragmatic statecraft, pioneering initiative, and openness and inclusiveness—into the “blood” of Huxiang culture, thereby shaping its distinctive character.

Keywords：Yandi sacrifices; Yandi culture; Huxiang culture;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责任编辑：黄声波